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若干看法

孔寒冰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 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提出,目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处于低潮;三种“主义”错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必须正确对待“两个必然”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新的世纪,和平共处是处理两种制度之间关系的正确态度和基本原则。

[关键词]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491(2002)06-0006-05

Several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KONG Han-bing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How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e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of our tim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m have special mea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This thesis advances that existing movement of world socialism is not at a low ebb and the disorder of three kinds of “Doctrines” is the basic reason of sharp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We must treat “two inevitabilities”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correctly. In the new century peaceful coexistence is correct attitude and basic principle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systems.

Key words: socialism; capitalism; mutual relation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极其复杂的大题目,如何认识它们自身的发展过程,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正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思考这两个“发展的历史过程”之最终目的,还是要处理好两种制度的关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营造良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

一、目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处于低潮

由于社会主义本身带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感情色彩,所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人、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它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评估。不仅如此,即使在目前的中国,人们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同时,还一再要求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请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首先必

须要回答的就是对它的总体估价问题。自从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到现在,有以下四个不争的事实。

第一,由于在思想、运动和制度等方面都是自己的对立物,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人——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始终没有间断过对社会主义围追堵截、文攻武围,想方设法消灭社会主义。从 19 世纪上半期“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结盟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1]到下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革命的血腥镇压,从 20 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扼杀、遏制到下半期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和对苏东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是,将社会主义从地球上消灭则一直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第二,然而,也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从 19 世纪初的一种仅限于西欧一隅的理论,发展到遍及欧美各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仅 15 个社会

[收稿日期] 2002-09-26

[作者简介] 孔寒冰(1958-),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从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主义国家就拥有世界上的1/3人口、1/4陆地面积、2/5的工业产值、1/3的国民收入。^[25]如果再考虑到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恐怕无论是什么样政治倾向的人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已由小溪汇成波涛汹涌的江河这一历史事实。

第三,社会主义在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运动方面,或者是在制度方面,始终都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而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不久,就有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之别,到19世纪上半期更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以后,改良的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完全消失。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分为二,形成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改良的社会主义和以共产党为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1917年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领导、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的。即使是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等等。

第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和开放。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和原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更是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这四个事实说明,尽管有资本主义国家绞尽脑汁的破坏和捣乱,社会主义始终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壮大。在这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人类文明史上也书写了不朽的一页。

与其它任何理论、运动和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是常有的事。在这些挫折和失败当中,有被资产阶级血腥镇压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有共产党自己进行的左倾冒进的社会主义实践。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挫折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据此,许多人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并使社会主义陷入空前的低谷。笼罩这样

讲倒也不错,但是这很难说就是科学和准确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受到严重挫折的只是苏东社会主义,其它地区、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的命运并非都如此。如,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挺立潮头,而且在飞速发展。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在发展,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化了的共产党力量 and 影响都在扩大。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经过这场剧变,共产党力量下降了,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却相对上升,除了老的社会党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新社会党,社会党国际空前活跃。现在社会党国际有成员党139个,党员近3000万(是除中国外现在世界所有共产党党员总人数的三倍多),在近30个国家执政和参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124]在欧盟国家中,除了个别的之外,都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或参政。学术界之所以把苏东剧变看得比较重,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只承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视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为异类。其实,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是遭受了挫折,但如果将社会主义放大、还原了看,它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诸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等地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理论与实践都出现了新变化和新发展的角度,很难说如今的社会主义就不如以往的社会主义。

二、三种“主义”错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总不能认为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件好事。关于苏东为什么会发生剧变及其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国内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著述不可胜数。我认为,造成苏东社会主义受挫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错位。以苏联为例,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用毕生的精力、以各种方式试图印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各方面的优势,然而又都忽视了产生出苏联的沙皇俄国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忽视了沙皇俄国独特的政治文化,都想一劳永逸地割断苏联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苏联与沙皇俄国的联系。为了超越资本主义,苏联的领导人都不顾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3]其结果,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苏联没有学到,沙皇俄国落后的东西苏联又没有克服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沙皇俄国更落后、更野蛮的封建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大行其道。在这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受到的

伤害越来越大,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实际上更是不断地萎缩,到最后苏联差不多是在人民群众的反向欢呼声中走向死亡。这就是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悲剧。

这些问题出现在苏联东欧也不是偶然的。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却出现在东方(俄国、东欧和亚洲)。^[4]这些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几乎都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产生前提,其母体在政治上或者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或者是专制独裁,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经济上除了个别的(如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都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里实际上是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提前问世。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建立是否具有必然性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派和西方的自由派或者将十月革命说成是一个政变,或者认为它是偶然的事件。^[5]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之后,尼克松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论甚嚣尘上自不必说,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人也认为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犯了“原罪”。(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东欧剧变之后》,1991年第4辑)实际上,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出现的具体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像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式,根据实际情况将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施之外,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建立的必然性,比如,都拥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都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法西斯和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存在着能够担当起这些重任的共产党等等。^[6]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解决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应当如何发展等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就在这些方面,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误区。它们都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将自己定位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上,居高临下地俯视资本主义。于是,它们都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假骗人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蒸蒸日上,越来越繁荣,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日薄西山,每况愈下;在其它方面,社会主义也是在天上,而资本主义在地下。于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顾自身各方面的弱点,把反对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任务,无视非常现实的封建的政治经济残余的影响。结果,经济上非但没有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反被资本主义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人民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当中,十分贫困;政治上缺少民主,没有法制,个人崇拜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思想上保守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对外关系上闭关自守,自外于世界发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那种用封建的东西来批判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无从谈起的现象。

落后国家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给自己定位不能太高,必须承认自己在各方面的不足,或者说是落后性。不足也好,落后性也罢,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可能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而立刻就无影无踪。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先进的上层建筑。这就不仅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确立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奋斗目标,而且意味着在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方面要付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努力、更大的艰辛,因为它不仅要赶上资本主义,还要超过资本主义。实现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无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还是在完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是在形成新的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赶上之后才能谈得上超越。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超越,如果缺了也必须得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课”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从头搞资本主义。

三、正确对待“两个必然”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的曲折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认识上的不准确或者失误。这种不准确或失误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研究几个相关的问题。

如何认识“两个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他们在讲“两个必然”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

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所以,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地渡过危机、不断地获得新的发展,他们也承认越来越承认自己对资本主义生命力曾估计不足,修改自己的理论。但即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社会发展趋势意义上的“两个必然”。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关注的只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方面加以论证,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所代替的并非全部生产力都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而是生产力不发达或者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死抱着“必然胜利”不放就意味着对落后的现状聊以自慰,而死抱着“必然灭亡”不放则意味着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总之,“两个必然”就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借口。空洞的理论推导对社会主义真正地代替资本主义不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还容易陷入一种危害更大的坐以待毙的“宿命论”。

换个角度说,由于时刻都面临“必然灭亡”的威胁,资本主义总是有一种危机感。因此,资本主义一方面也加强对自身发展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自身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陷的研究;^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除了实施“扼杀”、“遏制”、“和平演变”等措施之外,也注意吸收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中对它们的发展有利的部分,如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等等。一位学者在回答“资本主义绝路逢生”的“秘密”时这样写道:“苏联刚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参照系,使资本主义从这一新体制中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12:159]另外,还有一本专著用了很大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8]上述这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这方面的效用。无论来自哪方面的批评或批判,都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医生,客观上都在帮助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也听不进来自各方的不同的尤其是反面的意见,沉溺于“必

然胜利”的幻想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这样的社会医生。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危机?

潜心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人们,更是着力于列举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其中最多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感情上说,社会主义者期待资本主义快点灭亡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过分强调危机的不可克服性的原因、不间断性的过程和毁灭性的结果。^[9]可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可以这样认为:“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也做了非常意义和有价值的研究,但是,由于没有能抛开长期以来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固定看法,所以,论证来论证去还是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只好将资本主义存在着的长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因素,而用其短处论证它“必然灭亡”。对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往往也是盯住其局限与不足的一面,而对其有效性缺乏充分的估计。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经常发生危机,在于针对这些危机而进行的经常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可以将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上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资产阶级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来克服或避免这些危机,大危机大调整,小危机小调整,从而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不断地完善起来。与此同时,危机爆发的频率在不断地降低,危机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危机的后果也在不断地弱化。研究这其中的原因和经验,对社会主义来说,大概要比讲危机如何如何不可避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要有意义得多。在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表面上好象没有任何危机,从来都是歌舞升平,偶然出现某种危机要么归于天灾,要么归于反党事件,要么归于敌对分子的破坏和捣乱。

① 这从近几年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见一斑,如美国学者W·E·哈拉尔著的《新资本主义》、华勒斯坦著的《历史资本主义》、丹尼尔·贝尔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托马斯·K·麦格劳著的《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英国学者约翰·基恩著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亚力山大著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加文·凯利等编的《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威廉·其要著的《资本主义的幽灵》、苏珊·斯特兰奇著的《赌场资本主义》、德国学者M·G·登霍夫著的《资本主义文明化》、马克斯·舍勒著的《资本主义的未来》、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著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著的《资本主义的动力》等等。

实际情况是,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和体制缺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国家都潜伏着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由于没有爆发的机会和可能,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解决,所以,矛盾越堆积就越多,能量储备也越来越大,一旦爆发则就是灾难性。苏东剧变可以说就是长期积累下的各种危机的总爆发,结果是葬送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

四、替代、趋同还是共存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对峙和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制度的层面上,或者是在国家的层面上,总体上说谁也没有能战胜谁,谁也没有能消灭谁,因而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都在发展变化,也都同存于一个地球上。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①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的时代(比如人口增长过快、自然资源缺乏、生态环境退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核战威胁、裁军与军控、国际恐怖活动、吸毒贩毒、艾滋病等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各个层次上的关系,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十分必要的。

两制关系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谁想快速地替代谁,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法,都是不成功的。在新的世纪,两种制度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恐怕就是和平共处,其模式是除了一球两制之外,还有一国两制。这里所谓的一国两制,除了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包容港澳台这样的资本主义地区之外,还指资本主义国家包容社会主义的成份,如社会民主党及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等等。这样一来,会不会出现西方学者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同现象呢?不会。他们讲的这种趋同论实际上讲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所以,国内学者大都是从反对和平演变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角度来研究“趋同论”。^[10]其实,这种趋同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由于每个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不一样,不用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难以趋同,在具体发展模式上资本主义也都没有完全

趋同,有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东亚模式等等。从多种模式角度来谈和平共处,从宏观方面说,主体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微观方面说,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种具体发展模式的共存。

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们之间的优劣成败最终也只从发展中得到印证。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所以,在当今世界,不仅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就是在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各种分歧、矛盾和冲突也难免发生。对此,除了健全国际安全机制、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无论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还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首先都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比如,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先进与落后不一定必然与某种社会制度相联系。资本主义并不是先进的代名词,西欧、北美、日本的资本主义很发达,可亚非拉地区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相对落后甚至很落后,社会主义也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搞不好,资本主义可以成为落后国家,搞好了,社会主义也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另外,无论是社会主义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或者是其它什么主义模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类型。除了差别之外,它们之间还会有许多属于人类社会所必需的共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比如,以选举制、任期制为基本特征的共和国政体,以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享有自己权利为基本特征的公民意识,以法制、科学、先进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平等、公开、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等等,是当今任何一个想要健康、快速向前发展的国家所不能缺少的。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取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除了对上述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之外,还必须解放思想,根据新的形势来丰富和发展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代替资本主义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如果从思想上寻找原因,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用长期僵化不变的理论来规范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思想和视(下转第45页)

^①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参见何方《我为什么要出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载《世界知识》,2000年3期。但是,我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对此还可参见黄宗良、孔寒冰《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社会主义与时代挑战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 Joseph P. Hester. Encyclopedia of Values and Ethics Santa Barbara ABC-CLIO, 1996.259, 260.
- [2] Lawrence C. Becker. Encyclopedia of Ethics (Volume II)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790.
- [3] Mark Timmons. Morality Without Foundatio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16.
- [4]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M]. Braun-Brumfield Inc. U.C., 1995.554-555, 790, 915.
- [5] 弗兰克纳. 伦理学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7.138, 197-198.
- [6] Michael Smith. The Moral Problem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5.2.
- [7] G.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35.
- [8] Daniel Statman. Virtue Ethics [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8, 11, 43, 44, 48, 261, 262.
- [9] Philippa. Foot. 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1.

- [10] Michael Slote. FROM MORALITY TO VIRT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2.87.
- [11] Mark Timmons. Conduct and Character Belmont [M].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1.240.
- [12] Barbara MacKinnon. San Francisco 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90.
- [13]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50, 143, 239.
- [14] 麦金泰尔. 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2.
- [15] Gilbert C. Meilaend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irtue [M].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 [16]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4.292.
- [17] Stevn M. Cahn, Peter Markie. Ethics. Histo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681.
- [18] Tom L. Beauchamp. Philosophical Ethic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152.

(上接第 10 页)野也受到历史发展的局限,世界上后来出现的许多现象是他们没有也无法预料到的,许多问题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劳永逸解决了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刚刚 25 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在该书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做了首次修改和补充。如果能活到今天,亲身体验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还会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更大的修正,不会同意人们抱着他们的原汁原味的观点不放。早在 1887 年,恩格斯就曾告诫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

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型的理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修正、丰富和发展它。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生命力,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才会有前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仔细想一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重新调整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调整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前一种关系的调整使不同的运行机制结合在一起,后一种关系的调整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从本质上说,这两种调整都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过程,是追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说,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改革开放也是唯一

的出路。改革开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统理论,根据实际发展,更新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限制社会主义的实践,相反是用常青的生活之树去装点、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不断增进活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2] 肖枫. 两个主义一百年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51, 124, 159.
- [3] 闻一. 山外青山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0.
- [4] 卡尔·兰道尔.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一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5] 刘淑春. “十月”的选择——90 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 [6] 高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本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宋荫荣. 开创人类新文明伟大实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9] 陆惠林.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两上必然” [J]. 当代思潮, 2001 (4).
- [10] 辛向阳. “趋同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